



■《泰戈尔诗选》封面

在穿越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之何去何从，思想家们的思考似乎要比政治家们来得更积极。民国成立后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一大批享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被相继邀请到中国来“布道”，比如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玻尔、萧伯纳、卓别林……还有泰戈尔。

当时的执政府或山大王“戡乱”、“兼并”还来不及，哪有闲功夫听几位外国文士“扯淡”。出面邀请的人，绝大部分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是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或民间

社团的代表。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改善和推进中国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的现状和进步。

过去，有些人总以为，把那些大师请来做演讲的人，无非是宣传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即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大师的立场和思想，就会清楚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再说，那些大师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演讲，当然也不会

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迷狂状态。

把那些大师请到中国，哪怕只是短暂停留，不管目的何在，客观上则显示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开放意识、学术敏感和宽阔胸襟，与大师零距离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渗透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当中。从另一方面说，关注中国文化的前途，或者放大了说关注国家的命运，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和可贵品质。

经过七八十年的历史沉淀之后，我们对此看得更为清晰了。◆ 剑箫

旧闻新读——文化界辩论

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主张，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纷争。

1923年10月，郭沫若就以一篇《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文章中说：“‘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而当年最早将泰戈尔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发表了多篇政治性评论，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并且请泰戈尔“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

作为信仰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学者的林语堂在1924年6月也发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批评“泰戈尔大谈精神生活也无过是一种反应……我们只须先认定他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所以谋自存之道，不是什么哲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一办法，谓之精神安慰。”

鲁迅1924年11月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尔访华时语带讽刺：“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与此相反的是，梁启超与泰戈尔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甚至把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

胡适说泰戈尔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一个人”，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

徐志摩毫不隐瞒对泰戈尔的崇拜之心，认为泰戈尔“可称之为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

相关链接——泰戈尔的演讲词（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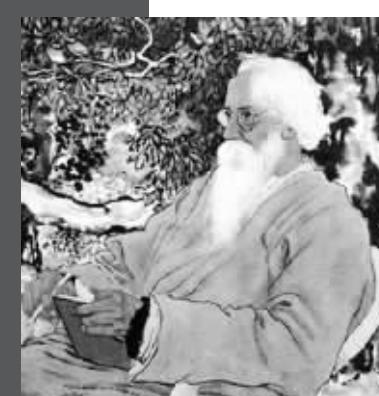
余最初对于中国，实于印度大戏剧家嘉利达之剧中得知，盖其中有一场，风掣旗帜，流苏动荡，而此流苏，即为中国制品。在此种含有诗意之感觉中，即得中国文化极深之印象。中印两国，本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之印度传来中土，即为中印两国文化互换之机会，印度以自身文化作礼品，赠诸中国，中国乐于接受，此种伟大的、牺牲的、包罗万象的精神，充溢于东方，因而造成东方伟大之文明。至余此来，实受一种感动，对于中国目前处境之危险、事端之繁杂、人民之痛苦，均所深知。每为祈祷，希望得安然渡此难关。

余之来也，非旅行家、非佛教者，实为求道而来，故余所携，惟敬与爱。余至中国，如居古庙，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趋于败坏，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得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即如余来上海，在城市间固未曾得见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此诚深以为憾。野草枝蔓，损及田禾，此种现象，实所痛心。中国文化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呜呼可？

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石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物质发达，真趣消失，将来世界，恐徒见闪烁死的光彩；欲觅生的物质，且不可得。即如印度恒河，固世界有名之大河，两岸风景，优美绝伦，今则烟突林立、机声盈耳，自然真趣，消失无遗，每为之唏嘘长叹。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也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位置，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

余非政治家、亦非外交家，不过一纯粹之诗人，只知心有所感，尽以告人。见兹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而此种工作之具，尤非牺牲不可……

天空无痕 鸟儿飞过

▲《泰戈尔》
(徐悲鸿画)

过眼烟云——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仅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巨匠，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上海是泰戈尔1924年4月—5月、1929年3月和6月三次驻留之地，尽管最为轰动、影响广泛的首次访华诱发了中国文化界的极大争议，但其在上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一页篇章，今天依然是值得纪念的。

迎接泰戈尔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以64岁花甲之龄，携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国画派大师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泰氏大学葛玲教授和纳克博士等六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为了迎接泰戈尔访沪，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王统照两人，当天就从北京动身来上海，“徐为氏作译员，王则为氏编辑演讲纪录”。当时准备欢迎者，除文学研究会外，还有上海青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所以还设立了“组织委员会”，“请郭秉文、殷芝龄、刘湛恩三君为委员，已定沧州旅馆为泰戈尔之寓所”。

泰戈尔人未到，著作先热。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这一天（4月12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发布的一则“欢迎泰戈尔”广告：我们盼望好久的印度大诗人兼哲学家泰戈尔氏已经来沪了！我们于欢迎之余，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要有一番研究才是，那么下列各书，都是我们亟应阅读的。这些书刊包括：

《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冯飞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泰戈尔戏曲集》(瞿世英译)、《谦屈拉》(吴致觉译)、《春之循环》(瞿世英译)、《小说月报·泰戈尔号》。民智书局也推出了泰戈尔《人格》一书。难怪《民国日报》不无调侃地说：泰戈尔“平生所作诗歌甚富……此次泰氏来沪消息传播后，此种出版品销路亦为骤增”。

上海，给了泰戈尔热情的拥抱。

知识界的责任

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圣雄”甘地的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只有对英国这样的殖民者才能奏效，倘若操作法西斯独裁国家，断无成功的可能。这已是常识，也可以说是泰戈尔之所以受到一些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多少都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缺陷，毫不奇怪。而大师的到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响，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脑子没

▶ 泰戈尔(左坐)与徐志摩(左一)、林徽因(左五)等合影

◀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泰戈尔：争议中的上海之行

精彩演讲词

4月11日，吴淞口外大雾茫茫，“来沪各轮多遭阻住”，一直到12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在晨曦薄雾中，“热田丸”号终于“至杨树浦之汇山码头停泊”，“到船迎接者，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潘公弼、钮立卿等，本埠印人与日人往迎者，亦有30余人”，《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中外媒体，也到现场采访。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在接受东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即席阐述来华宗旨：“予此次来华演讲，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拥护提携。”

上岸后，泰戈尔即来到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23号、24号房休息。泰戈尔告知徐志摩等人，因“近来身体不甚康健”，加以“不甚喜在公众演讲，愿与少数人聚谈”，虽然这次将“演讲东西洋哲学，惟仍不喜多见客”，所以，即便是印人“群访者甚多，仍不肯接见”。

下午5时，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一行游览了上海的龙华古寺，观赏了正在盛开的桃花。晚上8时，泰戈尔在沧州别墅与徐志摩、瞿世英、张君劢、殷芝龄等人小酌。席间宾主言谈甚欢，“至9时半始散”。

4月13日上午10时，泰戈尔携徐志摩等游览哈同花园。下午2时，参加本埠闸北印人欢迎会。4时—6时半，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四个团体假借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草坪，举办欢迎泰戈尔访华茶话会。

到场名家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张东荪、黄柏樵、朱经农、陆鼎揆等百余人。4月14日《民国日报》描绘其中的场面：“场中前方用桃柳标栏环成半圆形，中置红绒沙发，备作泰氏座位，来宾席设后方，计划百余人，席不能空，则均蹲坐草场。”

在与会者热烈欢迎声中，泰戈尔发表了来华(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鄙人不能操华语，以前又未至中国，与人民相接触，且非一演说家，只为一诗人，故在众人前发言，略觉胆怯。致此次之来华，盖因春日

和暖，万象更新，诗人亦觉思动。惟余只为一诗人，实难有贡献。诸君若有所求，贵国自有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及其他伟人在，故欲希望余有所贡献，却为难能之事。但中印同为东亚之国，故余临是地，较至他处为亲热，两国国情虽有不同，而余又不知华文，然余甚亲近诸君，敬爱诸君，两国人民犹如兄弟。又为事当存信心，若有信心，事必成功。吾人对于世界，当不分种族，互相切磋，择善而从。吾人可将此道由东方推行至全世界，尚劝道不尚武力，并望华印两国之友谊，日益增加……

4月14日，泰戈尔一行去杭州游览。回沪后的4月18日下午3时半，文学研究会、江苏省教育会、大同中学、中华学艺社、青年协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约瑟大学、中国公学、申报等上海20多个团体，各界人士约1200余人，假座商务印书馆，开会欢迎泰戈尔。

欢迎会由沈信卿、聂云台联袂主持，沈信卿先致介绍词，指出泰戈尔此次“不仅东方精神，得以表现，而全世界和平之朕兆，亦得于诗人之精神中”。王统照致欢迎词，称赞泰戈尔“以诗人言，则为世人所尽赞许；以教育家言，则其事业于世界教育史中，独辟一新地位；以哲学家言，则在融合东西洋及黄白人种间文化之功，亦可称道”。随后，“衣玄色长袍，冠红帽，仪容庄严而肃穆”的泰戈尔发表演讲，由徐志摩翻译。

期间休息，由周映湖演奏古筝名曲《普庵咒》，曲调悠扬婉转，很是动听。泰戈尔“亦凝神静听，若甚有感”。

散会时，已过6时。

晚上8时，各团体代表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宴请泰戈尔一行，赴宴者中外人士共60余人。

席间，宾主互致谢词，并欣赏了古筝和京剧名曲。9时半散席后，泰戈尔一行意犹未尽，即至第一台观京剧，12时赶赴招商码头，19日晨北上南京，继续他的中国之行。

5月25日，泰戈尔北上演讲后回到上海。5月28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夕，在上海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告别辞”，其中有一段说：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易的闹市。

5月29日，泰戈尔一行即启程去日本访问，继续他的东方文化之旅。◆ 章云华